

视角、构成与特质： 信息安全视域下的新媒体话语研究

路璐

内容提要 信息安全视域下的新媒体话语研究需厘清处在自由与控制两极之间的理论视角；了解深嵌在web2.0中的话语元素包括结构、意义、互动管理、社会现象四个层级，它们构成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话语世界；作为一种话语战争，需理解它复杂的双重性，重视新媒体语境所带来的政治文化修辞学的变迁，了解虚拟空间联系着现实的母体空间。

关键词 新媒体 信息安全 话语权 虚拟空间 新传播革命

路璐，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210095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 210046

在2013年“棱镜”(PRISM)计划跟随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一同亮相在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之前，占据新媒体学术研究主流的关键词一直是“自由”、“开放”、“参与”。直到《华盛顿邮报》和《卫报》等陆陆续续披露，在“棱镜”计划中与政府合作共舞的不仅是微软(2007年)、雅虎(2008年)、Google(2009年)、还有Facebook(2009年)、Paltalk(2009年)、YouTube(2010年)、Skype(2011年)、苹果公司(2012年)——新传播革命中的明星公司全部在列时，新媒体的另一关键词——“控制”浮出水面。

人们不禁要问：这还是不是一个当初新传播革命中许诺的“美丽新世界”？其实，两种研究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信息的全球化流动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与民族国家的疆域，甚至改变了“人类的社会形态”；另一种声音一直在审慎地提醒着步入全球化时代后，民族国家利益框架内信息安全的存在是个巨大的问题，围绕网络信息传播控制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一个区域性的话题很容易“操作”成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话题。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国家形象的维护易攻难防。有学者更是以信息安全中的主权所有为着眼点，细分出“主权国家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关键硬件设备的控制权、对互联网软件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在互联网传播领域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以及依法保障公民网络通信自由和政府、组织、个人信息安全的权力^[1]”。本文以话语为关键词，试图以一个新的理论维度探索信息安全视域下新媒体话语的名与实、构成与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梦视域下强化江苏国际传播能力与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14SZA003)阶段性成果。

[1]夏德元、童兵：《网络时代需要强化“领网主权”意识》，http://news.gmw.cn/2014-03/17/content_10687650.htm。

特性、微观与宏观、虚拟空间与社会母体之间的林林总总。

一、自由还是控制：争议中的理论视域

信息的全球化流动与信息安全构成了富有张力的概念两极，一极是“自由”，自由首先是附着于新媒体空间带给人类全新的生存空间与社会形态，认为一种真正的全球信息传播空间业已形成。美国学者霍华德(Howard)最早提出了信息自由化流通中的全球传播，他认为，“全球传播指研究个人、群体、组织、民众、政府以及信息技术机构跨越国界所传递的价值观、态度、意见、信息和数据的各种学问的交叉点。”^[1]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提出视野更为宏大的全球化范式，并列十个范式：“一种全新的学说方法论的创新、理论与实践的新型关系媒体和传播在当代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超国家组织的发展对在地化或地方化的重新重视；社会主导或控制中心的缺位；媒体和传播的多中心化；地区性市场的发展；全球媒体产品的出现等。”^[2]

“自由”与技术乐观主义的思潮紧密相连。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曾预言互联网的普及将会让信息分享无比平等而自由，会使控制去中心化。最具抒情性的应属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信息主义精神”，他论断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在工业社会中是有解释力的，但在网络社会中就有其局限性了。在信息化条件下，社会由独立个体追求金钱、权力、幸福或效益而推动的旧秩序，正在为新秩序所取代。街头政治、示威生态、社会运动已成为新秩序的焦点，开启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正是“信息主义精神”^[3]。以自由作为关键词的研究者依托于新媒体为载体信息的全球化流动，强调信息的跨国界、去地域化流动，重点是世界的公共领域与全球性的治理。在这样的思潮下，信息全球化流动所构筑的媒介空间越来越增添理想化色彩，甚至它的存在本身也具有某种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国内也不乏学者热烈拥抱这一思潮。

作为张力的另一极，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这个技术乐观主义者神化的“理想空间”去魅，发现另一重属性的关键词是“控制”。达尔(Dahl)从一种客观性的观察讨论网络空间的政治性倾向，他发现网络内容的分享，已经成为政治传播研究的主流^[4]。格里尔·克里斯(Greer Chris)等学者以2009年G20峰会期间发生的抗议活动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抗议期间新媒体技术的使用与影响，他发现新媒体作为利益表达的平台，往往是冲突双方进行话语、利益和权力争夺的独特场域^[5]。其中，最知名的当属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他毫不留情地破除一种天真的理论幻想即网络空间是理想的全球公域，将之还原成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博弈、交锋的新战场，各个民族国家构筑自身国家形象、追逐软实力的新领域。他认为“新媒体空间依然由主权国家分治”，他还援引“谷歌退出中国”事件，详细分析一种商业上的计算是如何成为谷歌进行品牌维护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起初的商业争端之后，美国政府将之引向政治上的分歧——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后，美国政府立即声援，美国政府官员在网络自由的演讲迅速加上该例，这一商业事件成为抹黑中国的符号。并且在此之后，美国政府总是援引“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作为自身所宣扬的网络自由的新规范^[6]。

[1]Frederic, Howard H.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63.

[2]科林·斯帕克斯：《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3]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页。

[4]Dahl grena P. *The Internet , Public Sphere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05). 22(2). pp.147-162.

[5]Chris, G. & Eugene, M.. *We Predict A Riot? Public Order Policing, New Media Environments and the Rise of the Citizen Journalist*, *British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0, Vol. 50, Issue, pp.1041-1059.

[6]Nye, Joseph S.*Future of Power: Its Changing Nature and Us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NY, USA, Public Affairs,2011,p.140.

无独有偶,今年爆发的“嗡嗡悠”事件又一次揭示了新媒体空间中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信息安全战争是如此激烈。作为“棱镜门”事件的后续反应之一,2014年4月4日,美联社(AP)发表长篇深度报道,揭露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秘密制造的“嗡嗡悠”事件。“嗡嗡悠”(ZunZuneo)是葡萄牙语中古巴蜂鸟叫声的拟声,也是为了模仿推特命名出处。按照维基百科英文网页上的解释,“嗡嗡悠”是USAID在2010-2012年为古巴青少年用户量身定做的在线社交媒体与微博服务项目。美联社获得的文件显示:“嗡嗡悠”大费周章,在开曼群岛银行开户,洗白资金来源于美国政府。形式是通过“非争议性的娱乐内容”如足球、音乐和飓风讯息的发放,扩大在古巴的订阅群,当订阅人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后(如几十万),就引入政治内容,试图引发革命,造成所谓“古巴之春”(Cuban Spring),推翻古巴政权——作为对阿拉伯之春的模仿^[1]。当然,这个新媒体战略遭遇了双重失败:从项目效果看,影响力近似于零,古巴人口有1100万人,“嗡嗡悠”服务在积累到4万用户量的时候,就因为USAID没意愿出钱继续支持而在2012年中完全停下来,到头来一条政治消息都没发出过,更遑论实现它最初的宏伟战略目标——“重组古巴国家与权力社会的平衡”;从国家形象看,该项目一经美联社曝光后,国际舆论质疑声四起,质疑美国政府在互联网空间的越界,混淆了间谍和外交之间的界限。

如同理想与现实,如同冰与火,领网主权与信息全球化流动,这组看似无法相融的概念就真实存在于当下的人类社会。这种对立似乎又一次回到了传播学发展中经典的核心之争,就是信息流动的自由与公正哪一个更重要。耐人寻味的是,信息强势的国家强调自由,信息发展弱势的国家强调公正。但是本文无意深描该争论的历史轨迹,只是直接跳入一个复杂的现实,新媒体空间对主权国家的考验加剧,信息的全球化流动中民族国家的控制权与争夺战激烈化,一面是“网络构成了新的社会形态”,公共空间的全球化成为不争的事实;另一面就是主权之争与意识形态不得不零距离的短兵相接、正面碰撞。新媒体注定是各种话语的博弈场与交锋场,因为虚拟景观的母体永远是现实社会。只不过,新媒体平台特别是web2.0所呈现出的自由与平等的幻象很容易遮蔽表象之下信息安全战的暗流涌动。

当然,这也形成了一系列深刻的悖论。本应该成为超越民族国家之争的全球空间更深陷于国族利益之网;信息全球化流动本应填补弱势与强势差距,却更好地成为强势力量手中的利器。信息安全的存在正是表征着新传播形态中信息流动依然无法回避的政治本质。

无法回避的还有技术与经济本质。Web2.0时代生存下来的巨头们无一例外采用了一种激进的方式来达到互联网去中心化(internet decentralization),目的不是为了民主与自由,而是更好地从互联网第一次泡沫破灭中存活下来:参与化的平台与以兴趣为聚合点的社群建构是为了悄无声息地细分市场与区隔广告客户;在推特革命中大出风头的“tag”标签,初始的设计目的是有效利用消费者的参与作为自助服务和数据管理,更好地减低成本。简而言之,这些在技术乐观主义研究者眼里闪闪发光的特质其实从诞生起就深嵌在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中,无从逃离。有了这个本质,新传播革命下的理想主义就变成了一种话语资源,一种新的政治修辞。这正是我们理解新媒体话语的重要理论视角。

二、四个层级:新媒体话语的构成元素

如果把民族国家在全球新媒体空间中的信息安全维护视作一场攻防战,那么赢得战争离不开对武器精细的了解与掌控。目前,西方学界走在新媒体话语研究前沿,这一点正是与他们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强势与领先地位成正比的。

由于新媒体话语深嵌在web2.0媒介环境中,西方学界已越来越倾向用话语2.0(discourse 2.0)这种提法来表征新媒体话语的名与实、微观与宏观、承续与创新等诸多内涵与外延元素。话语2.0究竟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ZunZuneo>。

是什么,它是一种学者安德鲁措普洛斯(Androutsopoulos)认为的“多主体参与导致的复调话语生成”^[1];它表征着勒尼汉(Lenihan)认为的“从宏观语境对媒介话语的影响,如社交网络的地域改变,在一百个国家使用时社会制度与文化差异对最终话语本地化的影响”^[2];它也是彼得森(Peterson)所说的“交互性的管理环境”^[3];更进一步地说,正是使用者“对 web2.0 的使用局限克服进一步造就了话语 2.0”^[4]。赫宁(Herring)在综合前任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在 web2.0 环境中的话语 2.0 的四分法:结构(structure)、意义(meaning)、互动管理(interactive management)、社会现象(social phenomena)^[5]。这四个构成元素同样也是具有层级性的,从微观到宏观,从媒体的虚拟世界连接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现象,并且包括了一整套横跨哲学、符号学、社会学、阐释学、控制论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综合以上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取精用弘,笔者把这四个层级的名称、议题、现象与研究方法用下图呈现。

第一,话语 2.0 中的底座——“结构”代表了新媒体在发挥作用时依然延续了传统媒体的惯用战术如框架(framing)、排版(标题、导语、引文和重要段落的体现)等引领议程设置、引导公共舆论。新媒体话语中“框架”依然是实施“战争”的基础,选择、强调、排除、增加和精心处理

层次	议题	现象	研究方法
结构	话语形态(如口头还是书面); 版式呈现; 框架(framing); 类型特征等	句法、形态学; 话语基模 (discourse schemata)等	文体学;深描;语言学;文本分析等
意义	意图设定; 信息传递; 目标达成	话语的内涵、 语言行为与符 号交换等。	符号学、范式理论等
互动管理	时机掌握; 交互能力; 协调与修复; 共建等	互惠;序列等	对话分析;微观人类学的民俗研究法等(ethnomethodology)
社会现象	社会动力学;权力;影响力;身 份认同;社区;文化差异等	社会动员、集 合行为、社会 冲突等	社会学;政治传播;互动语言社 会学(international sociolinguistics)、传播学中的民族志研究

等方式使得新媒体空间中媒体框架的对抗性比比皆是,这不仅体现了价值取向的不同,更体现了话语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力的事实。

第二,“意义”在话语 2.0 中有枢纽作用,具有核心价值。何为传播学话语中的“意义”?美国传播学鼻祖米德(G.H.Mead)曾试着下过一个定义:“意义是思想的对象,经验的核心,互动的结果。它产生于社会团体间符号的交换之中,并在人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6]意义是理解传播与互动、自我与社会、媒介话语与语境的关键。传播学者古德温尔(Goodwin)有一篇颇为引人注目的文章,聚焦“阿拉伯之春”中社交媒体的作用,认为社交媒体的弱连接不可能推动有实质化的行动。实际上,他说对了一半,弱连接实现了强效应,靠的不仅仅是社交媒体渠道本身,而是渠道中的话语,更为精确地说,是话语中的“意义”在线上与线下、在地与全球、个体与群体间流通,它在群体性事件中提供了一个可以导致行动的“乌托邦”式的意义浮桥,即“承续一个共同遗产的历史性叙事和希望解决过去

[1]Jannis Androutsopoulos. Discourse 2.0: Language and New Media.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Edited byDeborah Tannen,Anna Marie Trester. 2013, p.64.

[2]Lenihan, Aoife. “Join our community of translators”: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Facebook. In Digital discourse: Language in the new media, ed. Crispin Thurlow and Kristine Mrocze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48.

[3]Peterson, Eric. 2011. How conversational are weblogs? Language@Internet 8, article 8. www.languageat internet.org/articles/2011/Peterson.

[4]boyd, danah, Scott Golder, and Gilad Lotan. 2010. Tweet ,tweet 、retweet: Conversational aspects of retweeting on Twitter. In Proceedings of the 43rd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ed. Ralph Sprague. Los Alamitos, CA: IEEE Press. csdl.computer.org/dl/proceedings/hicss/2010 /3869/00/03-06-04.pdf.

[5]Herring.Discourse 2.0: Language and New Media.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Edited byDeborah Tannen,Anna Marie Trester. 2013, p.5.

[6][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的道德、伦理和民族危机的努力,伴随着社会媒体提供交流机会,产生必要的连接以及共同的政治想象”^[1]。

如“阿拉伯之春”中的“茉莉花革命”,起源于突尼斯一个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死亡。网络上出现了大量他的图片、纪念网页以及“我们都是某某某”的标签。这些叙事指向一个意义核心——他是道德上的圣徒,是烈士,却被残暴、腐败的政府(警察)迫害致死。有西方学者称此为“虚拟圣骨匣”(virtual reliquaries)叙事^[2]。正是意义沟通了历史与现在。历史上伊斯兰文明的烈士叙事被今日在线新媒体中烈士的叙事所承袭;也正是“意义”连接了在地性事件与全球受众,让每个参与者有一种熟悉的、强有力的阐释情感结构,特别是“殉道”对有深厚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受众有特殊的象征意味;意义召唤出政治与社会的变革幻象,烈士之死提供了一个对非正义的现实世界的憎恨并号召人们推翻特权机构。简而言之,正因为“意义”的流通,新媒体才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第三,在互动管理方面,共建性非常值得关注,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新媒体语言。典型的案例如维基百科全书(Wikipedia),被认为是一种在线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其话语实现基于一种颠覆性的创新观念。从话语的生产主体看,它当然是UGC模式,一个条目可以被任何互联网用户所添加,同时可以被其他任何人编辑,而这些合作的主体之间甚至互相不认识;从话语的重心看,它聚焦一种历时性的过程而非成品本身^[3],它清晰地显示出集体成员的修改、删除、增添的各种过程,忠实地标识出引用的信源;从单个个体看,每一个成员的知识与经验有其局限性,但作为集体看,它接近“全知性”的视角;作为“集体性”的作者,在某个阶段暂时停止了编写,到下一个阶段“写作”又继续,如同历史一般,处在未完成、不会终结的阶段,而且更激动人心的是,没有人知道“写作”何时停止,何时继续。

第四,社会现象表征着话语2.0对社会实体的杀伤力,它包含媒介情境、集合行为、社会动员与集体行动等众多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空间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化、虚拟化,缔结出一种新型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话语2.0的催化下,更多私人化的议题与诉求进入公共领域,不再具有在地性的局限,信息生产与流通的秩序被重构。学者赫密达(Hermida)指出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工具——“Hash tag”。作为推特最具特色的属性之一,“Hash tag”的主题标签功能可以为庞大冗杂的信息进行聚合和归类,使当地的示威活动吸引全世界媒体受众的目光,它用来网罗分布于社交媒体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政治参与者,打破时空阻隔,建构一种全球化的“传媒界”(ambient journalism),最后又把这种支持反馈给当地的示威者^[4]。新媒体空间中的话语2.0重构了个体、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塑了新的社会认同与传播权力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组织性和动员性方面,社交媒体在多个国家诸多的公共事件中彰显威力,由于新的组织和动员方式成本低、效率高,且无法预估和防范。”^[5]

三、作为一种话语战争的特质

新媒体空间让全球变成了一个“村落”,各民族国家、各种文化思潮在这样一个空间“狭路相逢”,它们之间的博弈与碰撞,关系着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因为在全球网络社会,国家主权不仅体现在对

[1]Fenton, N. Mediating hope: New media, politics and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Studies*, (2008). 11, pp.230-246.

[2]Jeffrey R. Halverson, Scott W. Ruston, & Angela Trethewey. Mediated Martyrs of the Arab Spring: New Media, Civil Religion, and Narrative in Tunisia and Egyp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pril 2013, Volume 63, Issue 2, pp.312-332.

[3]Wagner, Christian. 2004. Wiki: A technology for conversati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group collaboration. *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13, pp.265-89.

[4]Hermida, A. 2010. From TV to Twitter: How ambient news became ambient journalism. *M/C Journal*, 13(2). Retrieved from <http://journal.media-culture.org.au/index.php/mcjournal/article/view/220>.

[5]刘小燕:《社交媒体在社会事件中的“动议”释放》,〔太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领土、领海和领空等现实空间的控制上,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对电子网络等虚拟空间的控制上。”^[1]新媒体空间话语权的争夺意味着民族国家生存空间争夺战的深层延伸。

首先,应以一种双重视角看待新媒体空间的“话语”战争,重视其名与实、修辞与本质之间的分裂。正如文中第一部分所深描的,新媒体话语语境的复杂性,需要我们拨开重重理论的迷雾,抛开自由的幻想。新媒体平台深陷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多重漩涡中,而它所呈现出的自由与平等的表象却轻易遮蔽了它的内核即传播中权力主体之间的激烈博弈。美国2011年5月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把现实空间的西方民主意识形态掺入其“管理”全球互联网的三个核心原则:基本自由、个人隐私、信息自由流通;同时宣称美国政府通过加强盟友关系、建立公私合作防御与威慑的安全防务体系。这一战略尽显民族国家利益框架中博弈的本质。在这场全球性的话语战争中,依然是在目的上强化自身的意识形态,在战略上“区分敌友”,在战术上因势、因时、因地制宜。

美国广播理事会新颁布的《应对创新与融合的影响——2012-2016战略规划》中提出要加强对中国传播,特别强调要增强其在中国互联网、社会化媒体以及手机受众中的接触率与影响力。“美国之音”在2012年财政预算中大幅削减传统广播投入,却在数字媒体转换和新媒体开发方面再增380万美元投资,建立20多个针对中国等国家的手机多媒体网站。话语的渠道虽然更新,话语体系依然具有某种延续性。西方新媒体对近期发生的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主权冲突的报道、中国香港的“占中”事件报道等等,都不是一种真正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报道,体现了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话语生产的主体性思维与寻找“异端”的惯性,既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他者,在各类涉华敏感事件的报道中采取“去主体性”的叙述;又有一种深远的战略图谋,话语体系成为了政治谋略的深层语法结构。

但是抛开新媒体自由的幻想,并不代表不重视新媒体空间中的“话语战争”带来的政治文化修辞学的变迁,这也是理解新媒体空间中“话语战争”特殊性的关键。卡斯特认为,信息自由流动为新媒体带来一种有创造力的无序性文化环境,这也决定了国家信息安全不同于领土、领空、领海主权之争,新媒体空间的“话语战争”有其特定情景、理念与话语体系。特定情景与网络传播中的人际传播(CMC)的运行紧密相关,传播者选择他们想呈现的一面,接受者又将其更进一步理想化,媒介渠道允许以其在想表达的时刻以任何方式表达,而反馈又进一步加深了其自我实现的寓言。

新媒体“话语战争”的特定规则,正如西方学者 Arquilla 与 Ronfeldt 所甄别出的新媒体环境中的话语风格是代表软实力的心灵政治(Noopolitik),区别于由硬实力驱动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它是对信息时代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的适应,重点在于理念、价值观、生活范式以及伦理,注重培养跨域受众的喜好、习惯与信仰^[2]。特定的话语体系强调参与性、开放性,备受瞩目的街头政治、示威生态、社会运动都是与这种体系有关。它强调以一种对话的形式重塑新闻,而不是专家式地讲述一个故事;而这种参与的便利性又使决心与动员都变得空前活跃,这些年在西方传播学界大热的“公民新闻学”(Citizen Journalism)、“别样新闻学”(Alternative Journalism)、“协作新闻学”(Collaborative Journalism)都是以这种新闻话语体系作为理论基石的。

其次,话语联系着虚拟空间与它的母体社会空间,考验着民族国家风险防范能力与对话语的控制能力。话语2.0的攻击与防守、赖以发挥作用的纽带都与web2.0特有的语言空间环境有关。它深嵌在新媒体时空权重的历史性改变中。在这样的情境中,新媒体话语侧重空间叙事,例如,无论是“阿拉伯之春”,还是“占领华尔街”,它们在社交媒体中大量传播的视频中,占统治性的空间元素是“街道”,街道正是底层的生死场,是阿拉伯小贩死亡的地方,也是美国金融危机中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日夜游荡的地方。在这些视频中,“街道”既是新媒体空间的一种景观和表象,同时也是社会结构

[1]夏德元、童兵:《网络时代需要强化“领网主权”意识》,http://news.gmw.cn/2014-03/17/content_10687650.htm。

[2]Arquilla, John, and David Ronfeldt. 1999. The emergence of Noopolitik: Toward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 Santa Monica, CA:Rand.

性压力的“症候”体现。正如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所说的,“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1]

西方学者朱莉·维斯特(Julie B. Wiest)等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一年之后,以实证调查的方式重新聚焦剧变之后的“革命”主体——阿拉伯世界的青年人与社交媒体^[2],这项调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理论预设与研究结果出现了巨大的分裂:Julie B. Wiest等预判“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各个国家青年受众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激增,组织社会抗议与政治活动成为他们使用的首要目标。调研结果却恰恰表明了一种“去政治化”的社交媒体应用。阿拉伯世界的青年受众群体呈政治不活跃性,较少触及文化禁忌,对身体健康等问题的关心,娱乐、交友是最多选择项。面对结果,作者试图以该群体没有深涉革命以及受调查者不愿公开真实情况等因素来解释。

其实,如果能从既定视角走出,就会看到硬币的另一面:远离政治的生活需求,正是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常态所在。“阿拉伯之春”与“占领华尔街”构成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某种现实表征,即在风险社会中,借助新媒体“全球新闻界”的产生,偶然的社会事件会成为引爆社会情绪的导火索,至于是否会构成局部或全局性社会动荡,则考验民族国家对“话语”控制的能力。在“阿拉伯之春”中,从突尼斯到埃及,当时的政权基本使用的都是“限时”、“驱逐”、“断网”等硬性手段;而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这项也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运动从一度沸沸扬扬到目前的悄无声息,最核心的战场发生在话语领域,“权力集团策略性地选择特定内容与传播管道以创造出信息透明的幻象,而事实上则是在监视,并窒息异见。”^[3]同时,还有本国知识精英对整个运动“意义”的贬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专栏作家吉娜(Ginia Bellafante)在《纽约时报》网站的一篇文章:这个活动缺乏团结,过程像童话剧一样,各种参与人实际上面临着如找工作、偿还学校贷款等不同的生活难题^[4]。

英国现实主义学者卡尔(E.H.Carr)提出了国家话语权(power over opinion),他依此把国际权力划分为三种类型: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舆论控制权)。军事权体现胁迫力,经济权体现收买力,这两者都是硬实力,而话语权则体现一种吸引与劝服他人的柔性力量^[5]。在“占领华尔街”的话语权之争中,权力集团窒息异见的的能力、知识精英的老练,都体现在对话语的高超控制上。当然,对话语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因为虚拟空间总是表征着实体空间,技术不可能凌驾在历史之上。

对于我国当下而言,信息安全的其他要素如主体与渠道已日趋完善,根据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指出,覆盖全球的中国新闻报道网络已逐步形成,部分硬件建设甚至超过了西方主流媒体。但是,对于“话语”的重视与研究还远远不够,如何以开阔的视野面对新媒体中信息自由流动,既不自外于这个环境,又不在西方主导的规则下亦步亦趋;提供具有全球共享性的话语意义框架,建构既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又能够思考、解决当代世界焦点问题的话语思想体系,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参与者和研究者来说,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平 啸]

[1][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1页。

[2]Julie B. Wiest. Social media use among UAE college students one year after the Arab Spring Abstract, Journal of Arab & Muslim Media Research 5: 3, pp.209-226.

[3]Jeffrey R. Halverson, Scott W. Ruston, & Angela Trethewey. Mediated Martyrs of the Arab Spring: New Media, Civil Religion, and Narrative in Tunisia and Egyp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pril 2013, Volume 63, Issue 2, pp.312-332.

[4]Correcting the Abysmal 《New York Times》 Coverage of Occupy Wall Street, Allison Killkenny, The Nation, September 26, 2011;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11.

[5]Carr, E. H.; Schlesinger, Rudolf Soviet Studies, 1950, Vol.1(4), pp.347-355.